

謝方文存



NLIC2970868636

谢方文存

谢方著



NLIC2970868636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方文存/谢方著.-北京:中华书局,2012.11

ISBN 978-7-101-08979-0

I.谢… II.谢… III.交通运输史-世界-文集
IV.F51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488 号

书 名 谢方文存

著 者 谢 方

封面题签 徐 俊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³/₈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979-0

定 价 88.00 元

序

蔡鸿生

今年中秋节后第四天，日暖风和，接到谢方先生从上海来的电话，说自己的文集即将出版，叫我写几句话置于卷端。我们俩是广州中山大学 1953 年至 1957 年的同窗，结下的学缘至今已近一个甲子，承命撰序，岂敢说不。但自知无力达到“序其意”的古典标准，只好“画饼”一张，聊报谢兄雅嘱。

离开广州康乐园的校门之后，谢方先生进入中华书局，在这家文化的“老字号”里坐了几十年冷板凳，从普通一兵到资深编审，寂寞勤苦，无怨无悔，有学有成，始终保持着“中华人”务实求真的本色。其突出业绩，就是为中外关系史学铸造两大基石：《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丛》一出现，就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它的社会效益，正在与日俱增。对主持其事的谢方先生，用不着戴“守护神”的华丽冠冕，称之为杰出的“打工仔”就算是实至名归了。

中华书局是学者型编辑的故乡。谢方先生除出色完成编务外，学术研究也相当可观。那部长达千页的巨著《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就是他和另外两位著名学者的扛鼎之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不少功力深厚的论文和札记，以及显示卓识的校注前言。至

于怀人纪事的回忆录,如《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等等,学术味、人情味俱足、早已脍炙人口,就不必多说了。在我的印象里,谢方先生似乎一贯关注明清时代的海外交通,其精力所萃在此,贡献最多也在此。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非常重视海洋世界的社会变迁,敢于揭示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代替的血与火的事实,与“海上丝路热”中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牧歌式叙事划清界线。实事求是,难能可贵。当然,《谢方文存》的亮点不尽于此,以上云云,无非是个人的一孔之见而已。

谢方先生的为人,谦和淳谨,没有丝毫的油气和躁气,大大方方,一如其名。他的文章,也平实明畅,犹如一袭朴素的布衣,耐看、耐用,耐人寻味。《谢方文存》问世之际,适逢著者八十之年。我愿借唐诗来致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祝谢方先生在“80后”的路上健步前行,生活如此,学术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8日于中山大学

我的治学之路(代《前言》)

《文史知识》历期已刊载过不少专家学者谈治学之道的文章,许多道理已是老生常谈,我又没有什么过人的专长,只不过是多年的工作中学到了一些知识。《文史知识》的编辑同仁却一定要我说一说自学之道,我只好将自己如何走上中外关系史研究之路的经过谈一谈。

一 一言定终身

先介绍一下“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的渊源。它是本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的一个名称,其前身则是形成于 30 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我国的史籍中,早就出现了关于外国的记述,除“正史”的外国传、四夷传等有专卷外,还有大量记载外国的专书。但是这些书主要都是史料撰辑,还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开始引进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著作,其中有一本英人玉尔(Henry Yule)和法人考狄(Henri Cordier)编注的《中国及其通道》(*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这是一部运用西方资料研究中外交通史的权威著作,使中国学者眼界大开。不久,张星烺先生便将它的主要内容加上中国方面史料,编注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出版,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中西交

通史”一词便流传开来。其后又有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专著问世,加上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如王国维、陈垣、冯承钧、岑仲勉等对中外民族、宗教、语言、地理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于是,“中西交通史”便在三四十年代中脱颖而出,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到了50年代后,国家又提倡中国与外国传统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研究,这门学问又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80年代开放改革,对外关系空前频繁,随着形势的需要和条件的成熟,研究历史上的中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和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便扩展成为“中外关系史”。现在很多大学都开了这门课程和招收研究生,有不少学者专门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它已形成一门颇有影响的学科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还未对中西交通史或亚洲史产生特别的兴趣,更没有想到将来会从事这方面的编辑和研究工作。我是在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以后,才逐渐走上这条道路的。那时在古代史编辑室并没有明显的分工,开始时我什么工作都做,哪一类稿子都看。不久我审读了一部岑仲勉的《突厥集史》稿,花了不少时间查材料,写了一篇审读意见,想不到竟被总编辑金灿然看到了,第一次得到肯定与鼓励,说我是个“懂行的”。其实我对突厥完全是个外行,只不过在学校时听过岑先生讲的《隋唐史》课,略知他的治学门径而已。到1959年初我从农村下放回来后,又审读了向达的《蛮书校注》,金灿然再看了我的审读意见,便对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姚绍华说:“就让他和向达联系,负责这套书吧。”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套什么书。原来1958年我下放期间,已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拟定了一个全国性的长期整理出版古籍规划,其中有一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向达先生

提出和负责拟订的。向先生是久已闻名的大专家,我觉得可以向他学到很多东西,也就没有异议。金灿然还特别对我说:“向达虽是右派,但你不必有顾虑,要把他的东西学过来,至于他的书什么时候出由我负责。”真是一言定终身,从此我就被安排走向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道路。从1959年到1962年我主要就在向先生的指导下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工作,“文革”以后又逐步走上研究道路,这样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二 由杂到专

编辑本来是个杂家,什么工作都要懂、要学、要干,加上我以前的爱好也比较广泛,什么书都看,现在要逐步收回来,专于一门,只有从打基础开始,系统地读一些基本的专业书。但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当时的环境和工作情况不允许我在上班时看书,而且我还要兼顾其他方面的编辑工作,如1962年我还被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参加编辑《蒋介石全集》等。但由于明确了专攻方向,而且又可边干边学,因此,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年时间,也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却是我收益最大的学习时期,也是我后来专业研究的奠基时期。

先说读书,我根据向先生的建议,结合在中华工作的特点,从文献学入手。向先生帮我开列了一个必读书目:1. “正史”中的外国传和四夷传;2.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有关外国书目提要及原书;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4.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5.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6.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7.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8. 向达《中西交通史》;9. 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10. 方豪《中西交通史》,我后来还加上向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先生说:“读完了这些书,

你不但打下了基础,而且还可以统览全局,可以应付各方面来的挑战。”直到现在,我还深深感到这 11 种书的确是学习中外关系史非常见功效的必读书。除《汉学发达史》外,各书都由有关出版社予以重印过,不难找到;比较少见的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也不妨在此稍作介绍。这是 1949 年北京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根据张星烺先生的史料汇编和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人的支那研究》等书浓缩写成。从公元 1 世纪直写到 20 世纪,两千年间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和著作,几乎囊括其中。特别是 19 世纪后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著作和机构,都有介绍,注释中并引有大量的书目和版本,因此它也是一部中外文献工具书。可惜此书尚未见有重印。这些书使我的专业知识大增,对开拓书稿来源,提高书稿质量也带来莫大好处。后来我策划和组织出版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就是受到它的启发利用外国资料,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以提高国内中外关系史研究水平为目标的一套丛书,很受学者的欢迎。

我的另一种学习方式就是结合业务工作,边干边学。我在编辑工作中大部分接触的都是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书,而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内也只有中华书局一家在出版这方面的书。因此当时国内各大学、研究单位的有关研究工作者都和我有联系,我可以经常向他们求教并了解研究动态。这不但可帮助我提高工作业务水平,而且也可提高我的专业知识水平。我在工作中随时记下了需要了解和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我积累资料的一种方式,成为日后撰写前言、出版说明、书评和论文的根据。如我在当初审读《西洋番国志校注》、《郑和航海图》等稿时,查阅了大量有关郑和的资料,这就为我日后写有关郑和的论文创造了条件。在看书稿时我又常遇到一些外国地名,我留意把有关资料记录下来,这就为后

来与人合撰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积累了大量素材。我把工作——学习——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我得以事半功倍地既完成了工作任务又学习到专业知识,又积累了研究资料。

我在工作和学习中的主要方法是多查、多问、多看地图。我的案头总有一大堆备查的资料书、工具书,多查是我的笨方法,但也是加深理解的好方法。解决不了就问别人,我经常带着一堆问题去访问学者、专家。1962年前我差不多每周一次到北大燕南园向达先生家中求教。夏鼐先生在考古所,离中华书局很近,他对中外关系史的出版很关心,我也常到考古所聆听他的指教,使我增加了许多中外文化交流中文物考古的知识。后来他在百忙中还撰写了《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我在读中学时便喜欢看地图,在中华书局时我的工作和学习都与地图有密切关系,我搜集了不少国内外的旧地图,可惜文革时丧失殆尽。至今我的办公室和卧室都挂有大地图,查阅地图已成了我一项业余乐趣和习惯,它不但促进了我对中外地名、交通的具体记忆能力,而且使我在思考有关问题时有着较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学好外语也是中外关系史的必修基础课。但很遗憾我对它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我在解放前中学学英文,解放后大学学俄文。俄文由于长期不应用,早已生疏;英语也不注意提高,只有看书的本领,讲和写的能力都很差。其他语种也没有学。研究中外关系史,外语应愈精愈好,语种也是愈多愈好,否则就有局限性,不能深入下去。古代的外语也很重要,如拉丁文、梵文和中亚各种古代文字等,都要熟悉,研究时方能左右逢源,棋高一着。季羨林先生就是从古代印度、中亚的语言研究入手,成为古代中印关系史的大学者的。

三 走向研究之路

我是直到 70 年代末期,才真正开展中外关系史的个人研究工作的。和学习阶段一样,也是从文献学入手。

我是 1975 年最后一批从咸宁五七干校回北京的。在此以前,大部分人都已陆续返回工作单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也已恢复,我则仍在干校继续接受改造。但我知道迟早总会回去工作,便利用干校后期管理松弛的机会,看些业务书籍。我原来的书在 1969 年到干校前已卖掉了。只好在到上海探亲时到福州路古籍书店买了一些旧的《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单行本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书带回干校,偷闲便看起来。不久,我又想何不趁这时候练练笔,于是便选了其中一种《广弘明集》试着作标点整理。过去我都是审读别人的古籍整理,从未自己动手搞过,现在第一次涉足其中,倒也非常投入。一别多年的佛学知识,又重新浮现出来了,过去所学的中外关系史知识,又能应用了。我仅有的参考工具书只有一本中华书局旧版的《辞海》,因此标点得比较粗糙,但毕竟这是我开始古籍整理的第一步,也是走向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第一步。正在标点该书一半的时候,咸宁干校结束了,最后一批学员都返回原单位,于是我又回到中华书局。后来我这部未完成的试作却因种种关系一直未能继续下去,始终躺在我的书橱之中。回到北京后政治空气仍很紧张,除整理二十四史以外,其他学术书稿尚无从谈起,直到 1977 年张星烺先生的后人要求重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我才重新投入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我又抓住《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不放,《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又恢复组稿,我的工作才纳入正轨。1979 年我又筹划《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组稿和出版,中外关系史的书稿开始进入正常运

转,这时政治空气已比较宽松,从此我便利用业余时间,投入研究工作。

我认为必须发扬我的优势,结合我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确定从整理古代中外关系史籍入手。由于佛教史毕竟不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没有继续《广弘明集》的点校,而选择了明代一部重要的中外关系史籍《东西洋考》。我用不到一年时间将此书做了标点校勘,写了一篇学术性的前言,又将书中的地名编写了一个地名索引,考出今地所在。此书于1981年出版,是我第一个学术成果,学术界反映还不错,从此我就有了信心,准备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此后我先后点校、注释、今译了八部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古籍,又和陈佳荣先生合作搞了一部《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又写了二十余篇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文章。十多年来,虽然没有什么鸿篇巨制,也没有多少真知灼见,但总算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领域中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成果。也总算不辜负向达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嘱托,编辑出版了一批中外关系史的图书。我的老师朱杰勤先生生前也经常给我来信,鼓励我坚持走这条道路。现在我虽已退休,但仍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明代的对外关系史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末了,再向年轻朋友们说几点我在学习和研究上的一些体会,虽也是老生常谈,但这些道理永不会过时,因此不妨再啰嗦几句。

1.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问,基础课绝对要学好。对中外关系史来说,中外通史、古汉语、外语是基础的基础;上面我说的10种专业书,则是专业的基础。基础打好了,然后再做专题研究,由博返约。大学四年,是打基础的最好时期,必须打好专业基础,然后才可谈研究。

2. 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怕居于少数,要走自己的

路。十多年前许多人都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范例。我当时就指出这种说法不正确。明成祖是为了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它垄断和打击了海外民间贸易的正常发展,是海禁的另一种形式。我这意见后来才逐渐得到许多人认可。对近几年炙手可热的“徐福东渡日本”说,我也持怀疑态度,我根据《史记》的第一手资料,写了一篇《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短文(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2期),但至今尚未见论驳的意见。

3. 要关心学术动态、信息,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如近几年出现某些关于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学术文章,所谈的大都是别人早已说过的东西,还自以为是新的创见,这就缺乏应有的学术水平,也谈不上真正的研究。

4. 学问无止境,在前进中要虚心求教,不断修正错误。我自己就常常出错,如我点校的《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寄冰室散人》诗中有“佳人元不是摩登”句,我觉得“摩登”一词是现代译名,古汉语无,便根据《文集》的浙西村舍本改作“摩登”,认为“摩”是指鸠摩罗什,“澄”是指“佛图澄”,均晋时高僧,一擅咒术,一擅阴阳,故下句诗称“幻术因循污此生”。我自觉可以说得过去。但书出版后才得到李固阳先生的来信指正,谓此诗句中的“摩登”乃摩登伽女,佛典中谓其女曾以幻术蛊惑阿难。李先生这一解释是对的,而我却改错了,只好将来重印时再改回来。有错是难免的,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拒绝别人的意见。历史上有些大文学家还有“一字之师”,传为美谈,何况我们初学和入道不深的人呢!

以上所谈,主要是一些往事的回忆,够不上是“治学之道”,但总算是自己走过的路程,因此本文题目便叫作“我的治学之路”。

(《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中华书局)

目 录

序	蔡鸿生 1
我的治学之路(代《前言》)	1
从“教仪之争”看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1
古代中外关系史籍透视	14
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33
中国史籍中之马尔代夫考	46
清初大汕的越南之行	58
中国史籍中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考	69
也谈文莱《蒲公碑》与《西山杂志·蒲厝》的关系	78
16 至 17 世纪的中国海盗与海上丝路略论	86
侯显出使榜葛刺考	
——兼论费信、马欢抵榜葛刺的年代	101
我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的旅行家——杜环	112
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117
郑和海外用兵略论	125
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	140
利玛窦贡物中的《万国图》辨正	149

龙涎·鸦片·红丸

——兼与徐朔方先生商榷	154
附：鸦片输入中国之始及其它	160
再谈龙涎及我国吸食鸦片始于何时	168
蒙奇兜勒的历史之谜“突破”质疑	171
论齐景公和秦始皇在山东沿海的航海活动， 兼谈徐福史料中的一些问题	174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徐福东渡史料辨析	186
呼之欲出的中国突厥学	193
也谈斯坦因与敦煌文献	197
张星烺先生及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202
《东西洋考》前言	205
《西洋朝贡典录》前言	212
《西洋朝贡典录》的学术价值	216
《咸宾录》前言	22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说明	223
《海外纪事》前言	225
《殊域周咨录》前言	235
《西域番国志》版本及校注说明	238
《职方外纪校释》前言	241
《职方外纪校释》出版的一点感想	252
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	255
博取中外之长，纵考古今之变 ——喜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272

二十六年间

- 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 279
-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简介 289
- 《玄奘年谱》简介 291
- 苏继庠撰著《岛夷志略考释》 293
- 《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本即将出版 295

海内遗珠

- 《回回药方》探源 298

不似词书,胜似词书

- 谈《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编写特色 302
-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导读 307
-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序 329
-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往五天竺国
传笺释》编者赘言 332
-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地理的奠基之作《道里邦国志》 335
- 研习明史不妨一读

- 简说《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339
-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来历和今后的打算 343
- 古代希腊罗马和穆斯林著作中的中国观

- 兼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和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348

- 西方汉学鼻祖: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354
- 喜见《行历抄校注》出版 359
-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1500—1840)国际学术研讨会”
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363
- 读《吴渔山集笺注》偶得 370

改造 定位 创业

——记 1950—1965 年的中华书局 375

三十年来的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 390

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

——记季羨林先生 395

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 400

向达《怀章俊之》一文后记 406

记阎宗临与樊守义

——读《选堂序跋集》偶得 409

双星陨落 痛失贤良

——悼念章巽、姚楠两教授 415

不该忘却的长者：宋云彬先生 420

忆咸宁干校 思畏友麦一 427

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

——记译坛骁将耿昇 439

教我如何不想她 444

法显 449

郑和 515

附录

卅年辛苦不寻常——一名读者的回顾 吴德铎 587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及其主编谢方 白化文 595

后记 605